



周恩来在延安





2 032 4204 4

周恩来历险纪实

成 元 功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历险纪实

主 编/成元功

责任编辑/徐永军

封面设计/谭德山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地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燕华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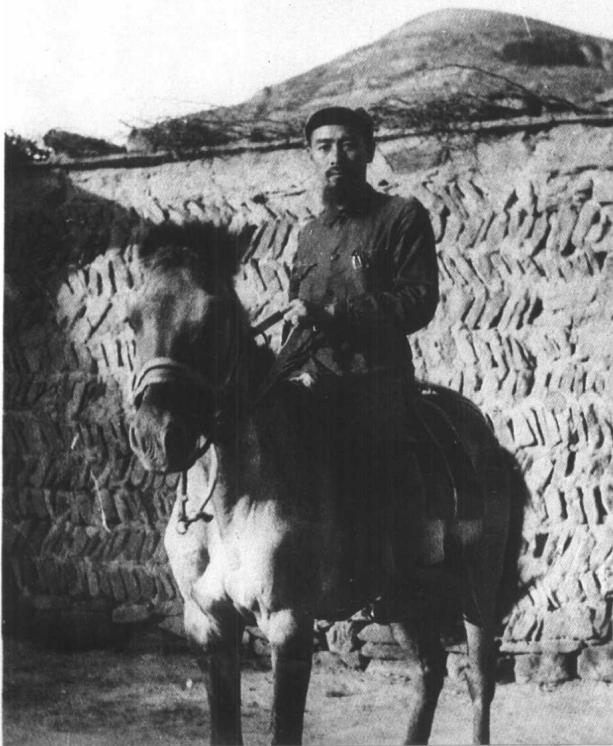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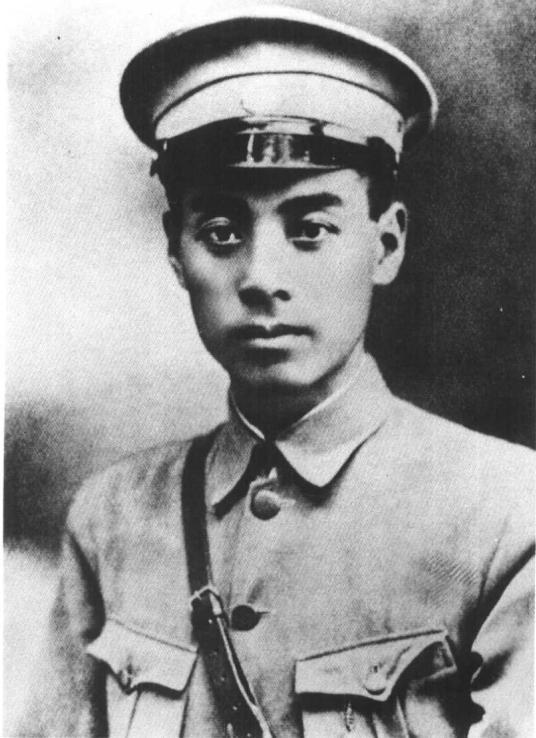
850×1168mm 32开 6.5印张 170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 7-5073-0204-0/K·48 定价：9.00元

担任黄埔
军官学校政治
部主任时的周
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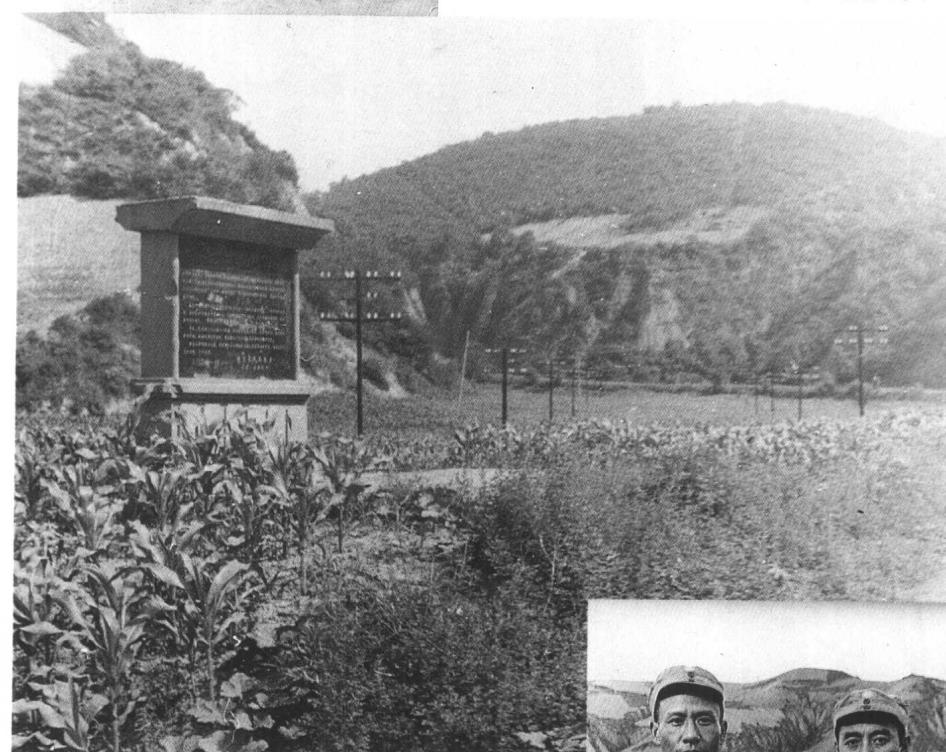


长征到达
陕北后的周恩
来。



1937年5月，周恩来与在劳山脱险的张云逸（左一）、孔石泉（右一）在西安合影。

周恩来劳山遇险地址和纪念碑。



1939年8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前与刘少奇在延安合影。



1940年3月，周恩来到苏联疗伤回到延安后锻炼臂力时的情景。



1945年8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前在延安机场与赫尔利(左三)、张治中(左一)、王若飞(右一)合影。

1955年4月，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发言。



国民党
暗杀队一成
员1955年4
月16日致中
华人民共和
国驻印度尼
西亚大使的
信。

敬啟者，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大使注意！中國國民黨駐
嘉達立國支部於本年三月初旬奉台灣總統府宣命組織二十八人之敵
死暗殺隊準備謀殺將赴萬隆參加亞非會議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田因長國氏

暗殺隊於三月十日在紅場黨部組成參加者皆為前中國國民黨逃
亡印尼的中低級軍官每人皆持美國大使館發給之無聲手槍及印
尼幣二十萬盾事成後每人加給二十萬盾打中國氏者加給四十萬盾
本月十九日在紅場黨部開最後一次全議決定出發日期
有麻亞非會議地形於本月一日至五日調查清楚
註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大使團智治安前頭即刻一網打盡保全
國土

反資本主義
暗殺隊員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加纳时与恩克鲁玛总统
(左一)打乒乓球，左二为陈毅，左三为成元功。

序

罗 青 长

周恩来总理故去已经十多年了，然而，千千万万的人们仍从心底深深地呼唤着他，怀念着他。

周总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誉满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建党、建军、建国的创始人之一。他革命一生，多次遭遇惊险危难，但他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超凡的智慧、渊博的知识、灵巧的斗争艺术。在危险局势面前，他总是以大无畏的气概，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处险不惊，舍己救人，常常勇敢沉着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据粗略统计，周总理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所遇险境达 20 多次，本书所记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当前众多的缅怀周总理的影视和书刊文章中，很少写到周恩来同志遇险和脱险经过的。毛崇横、何谦、成元功、高振普、赵桂来等都是做警卫工作的老同志，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总觉得不把自己耳闻目见或亲身经历周恩来同志多次险遭不测、化险为夷的经过写出来，公诸于世，便对不住周总理的教育，也有愧于后世。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邓大姐和他们原所属单位——中央警卫局的鼓励与支持，以及过去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赞同。1988 年他们开始写作，走访当事人，实地考察遇险地点，查阅资料，得到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他们态度严谨，在撰写过程中，坚持历史的真实性。1990 年在大型文学期刊《啄木

鸟》陆续发表几篇之后，获得了邓大姐以及当年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首肯。同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不料毛崇横同志脑血管病突发，未竟全功，不幸英逝，我深表悼惜。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九十五周年诞辰。根据出版社的建议，他们决定将前后已经完成的十三篇，连同邓大姐 1988 年撰写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先行付梓出版。为此，我谨向作者表示祝贺。同时，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希望学习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革命精神，珍惜今天的中国来之不易，使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所启迪，对今天的安全保卫工作有所借鉴，是为序。

1993 年 6 月 5 日

目 录

序	罗青长	(1)
从沙面射来的枪弹		
——记周恩来沙基遇险	赵桂来	(1)
作者附记：夜泊话险		(13)
找不到答案的枪击		
——周恩来遭蒋介石门卫枪击纪实	赵桂来	(16)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邓颖超	(22)
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读后	高振普	(26)
长征途中的一次医疗奇迹		
——记周恩来肝脓肿破裂获救		
王 磊口述 卞志强整理		(28)
危难中的转移		
——周恩来撤离瓦窑堡纪实	赵桂来	(32)
劳山枪声		
——周恩来劳山遇险纪实	赵桂来	(57)
夜出水西门		
——周恩来太原突围纪实	赵桂来	(78)
火海夺路		
——记长沙大火中的周恩来	陆高冲	(91)
延河坠马		
——周恩来断臂事故纪实	成元功	(110)

在重庆谈判中

——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纪实 颜太龙 (130)

今天一定要到达

——周恩来乘飞机秦岭遇险纪实 何 谦 (143)

万隆之行

——周恩来不避艰险参加亚非会议纪实 成元功 (156)

阜成门车险

——周恩来乘车遇险纪实 成元功 (176)

最真挚的友谊

——周恩来冒险访加纳纪实 赵桂来 (185)

后记 成元功 赵桂来 (197)

从沙面射来的枪弹

——记周恩来沙基遇险

赵桂来

渊 蔡

周恩来这次遇险发生在“沙基惨案”中。

周恩来生前曾向我们警卫人员谈过他两次遇险的情况：一次是我将在《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一文中所介绍的，另一次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沙基遇险。

“沙基惨案”发生于1925年6月，当时年仅27岁的周恩来，正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沙基惨案”是英、法等帝国主义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事件。

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也奋起罢工，声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23日，广州的罢工工人、农民和学生10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支持和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

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街的时候，早已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

枪猛烈射击，致使游行群众 50 余人当场死亡，170 余人受伤。当时一左一右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两位同志，第一排枪响，即被帝国主义军警的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倒在血泊中，周恩来幸免于难。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

沙基街位于广州城城垣的西南角。这里原本是个荒凉的河滩，自对面的沙面岛“繁荣”起来之后，才沿着河滩建起了一条西式街道。这条街道与沙面隔河相望，相距不过 50 至 100 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木桥，与沙面相连。“沙基惨案”后，革命政府为铭记国耻，已将其改名为“六·二三街”。

沙基街对面的沙面，原来是个小渔岛。沙面的南面是珠江和白鹅潭的汇流处，北面有一条小河汊，与沙基街的陆地相隔。现在的沙面，已成为广州市的骄傲，这里街道宽阔，树木苍郁。现代化的白天鹅摩天大楼直插云天，就像广州市高高扬起的改革开放的风帆。

但过去，这个渔岛却是帝国主义圈定的殖民地，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志。

早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入侵者就看中了这个可以由水路直达的小岛。他们贿赂清廷广州府的官员，以此作为“夷人”的“居留地”，允许他们在此居留和他们的商船在此停泊。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857 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占领了广州及广州附近许多城镇，直到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屈服议和之后，英法联军才在 1861 年退出广州。但这个小岛及小岛附近的水域并没有交还，作为租借地硬扣下来。到 1925 年“沙基惨案”发生时，这个小岛已被他们整治成可以代表“西方文明”的橱窗。他们不但在这里设了政权和管理机构，建了英、法、日、葡领事馆，开办了许多外国企业，还修造了当时看

来相当豪华的维多利亚大酒店。许多富豪就是鸦片战争前被欧洲人和亚洲人称之为“海盗”的人。这些海盗，一种是属于某国政府的，另一种则是当时所谓的冒险家们。当时他们合伙入侵，大肆抢掠，如今早已变得“文明”起来，成了“国中之国”的官方武装力量。在岛上为他们服役的中国人，不但备受虐待，而且进出小岛要持有他们颁发的证件，以及检查搜身。

小岛虽是弹丸之地，但它的辐射力却非常大，辐射面非常广。广州的官府、广州的社会都被它以高速和高效能地扫描着。他们自信已创造出一种新“模式”，即半殖民地的形式，可以收到统治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那种殖民地模式同样的效果。这种模式，始于清王朝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从未有过失败的纪录。但是，自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帮助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增添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实现了国共合作，帝国主义者感觉到与过去不同了，他们的“西方文明”屡遭失败。他们敏感地感到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而且是发生在西方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派兵企图扑灭列宁在俄国的革命失败之后。他们深深感到这是继俄国之后，在东方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险情，于是把这种险情概括叫“赤化”。

当时，一位英国人曾著文分析说：广州已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国民党已经有一种共产主义的趋向。军事学校已经在黄埔建立，学生由俄国军官训练，一般说来抱有俄国的观点。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发展到加入抗议“五卅案件”时就尖锐化了。

广州是他们侵略中国首开纪录破门得分的地方，他们要将这一得胜纪录保持到终场。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破门得分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武装方式。于是，1924 年 10 月间，在广州城发动

商团叛变；1925年春支持陈炯明攻打广州；1925年5月唆使据守广州城区的滇、桂军阀头子刘震寰、杨希闵兵变。“沙基惨案”就发生在6月12日平息滇、桂军阀头子的兵变之后，两者相距只有11天。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西方帝国主义者一再叫嚷“孙中山赤化”、“广州赤化”，似乎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永远保住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保住中国这块国土庞大、物产丰富的半殖民地。

当然，那位英国人说“赤化”是别有用心，但是1925年广州确实曾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许多共产党人曾经来过或集中在广州。其中著名的就有：李大钊、彭湃（时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苏兆征、杨匏安（时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董必武、谭平山（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林伯渠（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吴玉章。此外，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还有聂荣臻、肖楚女、熊雄等。

弄 潮

周恩来是1924年9月初，奉党中央调令从欧洲回到广州的。回到广州后，10月便被委派开始组建中共广东区委，并任区委员长兼宣传部长。接着又到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11月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是这年6月建立的，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国民党左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来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襄助他工作。廖仲恺对当时年仅26岁的周恩来，非常器重，曾在家中对他16岁的儿子廖承志介绍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广州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不再听任帝国主义宰

割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也是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最光荣的阶段，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的最佳年代（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即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所破坏），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并掌握一支武装力量的开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周恩来。

1924年冬，黄埔军校第一批学员毕业，组建了两个团，周恩来在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连队国民党党代表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除此而外，由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提议，经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同意，还组建了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共产党人徐成章和周士第担任队长。车队的活动直接由区党委和周恩来领导。铁甲车在当时是攻坚和防守的最先进的装备。党史权威著作认为，铁甲车队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而且是现代化的武装。

笔者为写本文收集资料时，在广州有幸拜会了当年铁甲车队的队员现在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魏鉴贤老先生。据魏鉴贤老先生说，那时外国的铁甲车还没有运到，队员先学驾驶汽车和军事，车子一到，就能参加战斗了。笔者认为，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是看得很远的。

1924年2月，周恩来回国前，在巴黎的《赤光》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鼓舞革命青年要冲上前锋去做弄潮人。他说：“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做弄潮人。”他9月回到国内，10月就参加了平息商团的叛乱，次年（1925年）3月又参加了黄埔军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进攻，6月参与了粉碎滇、桂军阀在广州内发动的叛乱。我们想，这时平生第一次投身戎伍的周恩来，是充分领略了在武装弄潮中的那种特有的风味的。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

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对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作了决议，要求猛力开展群众运动。也就在这次大会之后，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对中国民众大出杀手。这也许是他们从以海盗方式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时起，一贯沿用的对付群众反抗的“传统经验”。这年4月8日，美国军队在福州开枪杀伤数十人；5月28日，日本军队在青岛包围工厂，开枪打死打伤20余人，捕去70余人；5月15日，日本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枪伤10余人；30日，英国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捕去100余人；6月1日以后，英、日、美帝国主义又出动军舰，陆战队布满上海，对工人、学生大捕大杀，死60余人，伤70余人。

生活在帝国主义炮口下的广州人民，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五卅惨案”发生后，对帝国主义的暴行，群情激愤。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陈延年和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党在广州工会的负责人苏兆征、邓中夏，决定6月19日举行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为了组织好这次罢工、罢市，6月18日在广东大学召开了由广州各界120个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会上，各界代表愤怒声讨了帝国主义近年来在华的暴行，并决定成立“广州各界对外协会”，隆重推举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为协会主席，还决定以抗议“五卅惨案”声援上海工人和支持“省港工人罢工”名义，于6月23日上午举行10万余人的集会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军队列队参加，廖仲恺为大会和游行总指挥。

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自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若干年后，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这场斗争。他说：当时我从黄埔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6个连——每个团的一、四、七三个连，组成了一个营，从（国民党）党军里同样再抽调两个营去参加这次游行。要党的骨干去带领。周总理在这里没有提到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也参加了游行，很可能是一时